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3.011

“自然历史”：阿多诺对自然的重构

周泽东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启蒙理性遵循同一性逻辑。同一性意味着概念与实在的分离，且概念替代实在并拥有对实在的控制权。其结果，自我保存理性将内外自然彻底剥离，并实现了对自然的全面统治。否定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其核心即矛盾，矛盾双方具有向对立面转化的潜能。在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框架内，自然并非仅指同一性所赋予的外观——历史的维度，同时也具有原始自然的维度。自然是一种矛盾的存在，而且，它总是处于历史对它的否定与抵抗中，在具有反思性的否定中，自然获得了重建与救赎的可能。阿多诺的自然理论对破除自然与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对自然的理解具有观念性，且否定辩证法本身有一定的悖论性。

关键词：阿多诺；自然理论；启蒙理性；否定辩证法；自然历史

中图分类号：B83-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3)03-0092-08

引用格式：周泽东.“自然历史”：阿多诺对自然的重构[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3): 92-99.

“Natural History”: Adorno's Reconstruction of Nature

ZHOU Zed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Enlightenment reason follows the logic of identity. Identity means the separation of concept and reality, the replacement of reality by concept and the power to control reality. As a result, the reason of self-preservation completely separat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nature and realized the total domination of nature. The fundamental feature of negative dialectics is negativity, and the core principle of dialectics is contradiction, and it emphasizes that both sides of contradiction have the potential and power to transform into opposites. In Adorno's visio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nature does not only refer to the appearance given by identity-the dimension of history, but also has the dimension of nature, which is a kind of contradictory existence. Moreover, nature is always in the negation and resis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reflective negation, nature obtains the possibility of redemption. Adorno's theory of nature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break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nature and history, subject and object, but its nature is conceptual, and its negative dialectics also has certain paradoxes.

Keywords: Adorno; theory of nature; enlightenment reason; negative dialectics; natural history

收稿日期：2022-12-2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人文主义地理学视域下的地方美学研究”(22A0046)

作者简介：周泽东(1975—)，女，湖南临澧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学、文艺学。

在 20 世纪美学中，阿多诺显然是将自然美置于足够重要地位的极少数美学家之一。在 1970 年出版的《美学理论》一书中，他批判了以往美学对自然美的忽略，并用专门一章来讨论自然美的问题。在他那里，自然美因其非“非同一性”^[1]而被赋予救赎现实的期待。他建构自然美的理论前提是什么？或者说，他如何理解自然？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学理论》中的自然美建构问题，其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言，“只有根据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中继承过来的认识论难题，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一个更有争议的理论策略才变得可以理解：恢复自然美范畴的名声”^{[2][19]}。对自然的思考一直是阿多诺学术生涯的重大哲学主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自然历史观念》一文中，他就专门对自然概念进行了探讨。以此为起点，对自然的思考一直贯穿在他后来的《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等重要作品中。探讨阿多诺的自然观念，对于深化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自然之死：启蒙理性的后果

阿多诺对自然的思考，与启蒙理性纠缠交织在一起，其 20 世纪 40 年代的《启蒙辩证法》一文集中探讨启蒙理性问题，却始终围绕自然而展开。

康德曾如此定义启蒙：“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3] 启蒙就是人克服自己的无知、蒙昧状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在康德基础上，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将启蒙理解为：使人类从对自然的原始恐惧和崇拜中解放出来，从而成为主人。人类如何成为世界的主人呢？在他们看来，知识是祛除盲目并能成为世界主人的非常重要的途径。“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4]，从而达到用理性的正义来取代神话的非正义之目的。现代知识究竟如何建构？康德的知识论把人类知识分为两部分：感性和知性。两者有不同功能。感性提供直观对象，知性则以概念思考为对象；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按照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康德意义上知识的多重维度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即知识本身包括概念与实在，二者是统一的，但现在却分裂成单一的概念与实在。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注意到，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发展，无非遵循将存在分裂为概念与实在的逻辑：“自此时起，存在就分解为逻各斯和外部的万事万物。”^{[4]6} 概念与实在的分离是知识和现代科学产生的前提，更甚的是，在这种分裂中，最终知识导向并等同于纯粹的概念。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把启蒙理性的这种逻辑称之为“抽象同一性”。如同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同一性首先意味着概念与实在的分离，并最终用概念替代实在。这也意味着概念能代表其他实在的普遍性和总体性。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提出：“每一种体系都是这样的秩序，这样无意义的合理的产物：一种装作自在存在物的被法定的东西。它的源泉不得不迁移到脱离了内容的形式思想中，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控制材料。”^{[5]20} 任何所谓的体系都以同一性为核心，它是脱离了内容的形式，也就是纯粹的概念。更甚的是，当概念与实在分离后，往往概念具有优先性，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特殊或个体必须符合概念设定的同一性特性，不符合者则被视为异质或他者遭受排斥。很显然，“同一性”似乎习惯于从既定的概念出发来思考客体，将客体的丰富性、鲜活性和一切边缘、异质的事物都剔除出去。在概念与实在的分离中，概念成为压倒实在的优势力量，甚至演变成一种对实在的权力。在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看来，“权力与知识是同义词”^{[4]2}。正如阿多诺所言，理性并未给世界带来和谐与光明，反而“退回到了它曾决然想要摆脱的野蛮与蒙昧的窠臼之中，文化也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被具象化而跌落到了极权的深渊”^[6]。

知识的同一性建构正是基于克服人类对自然的恐惧的需要。人类使那些已经确立的自然规律成为他维持生存的手段，并且选取那些他有能力进行处理的部分进行改造，将自然的丰富性完全纳入自身的逻辑理性所构造的概念体系中，其结果是外在自然被排斥在自律的知识体系之外。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说：“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4]6-7} 压制实在自

然,最终确证自我,这是启蒙理性“抽象同一性”逻辑发展的一体之两面。因此,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存的理性。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曾对自我保存有详细阐释:“斯宾诺莎的命题‘保存自我的努力是德性的首要和唯一的基础’包含了所有西方的文明的真正原理……在从方法论上把所有自然的痕迹都作为神话的内容清除掉之后,这个自我就不再被认定为是身体、或血液、或灵魂甚至是自然的自我,它被升华为一个先验的、逻辑的主体,它就成为理性的参照点、成为有立法功能的人的行动的权威性的根据。”^[7]人的自我保存实际上就是自我抽象的同一性呈现,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与肉体没有任何关联,就如同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理性。因此,内在自然也被抽掉了。自我保存理性一方面抵制外在自然,另一方面对自我内部自然也进行清洗,现代文明即以清洗自然为目标。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返乡的神话,进一步说明了人类为了自我保存是如何抛弃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和他的水手们于返乡途中,一直面临着巨大的诱惑——海妖的歌声。海妖的歌声在史诗中象征着最原始的自然力量。对于谋求自我保存的人来说,海妖的歌声既意味着极端的幸福快乐,也意味着死亡,这是一种悖论。人若迷醉于海妖的歌声,则将返回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是没有痛苦的,即能享受极乐;但回返自然状态也意味着人主体性的消失,人将消融在自然中。自我的确立需要与自然保持距离,奥德修斯如何保持与自然的距离呢?首先,奥德修斯主动保持与外在自然的距离。为了自我保存,他学会了文明的狡诈,巧妙地将人与自然的距离关系转换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将他与自然的直接交道转换成水手们与自然之间的交道,而他的工作则只是对水手们进行管理。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与水手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劳动分工的关系,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工作并不与自然对象直接打交道,而是通过管理水手们而间接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自然并不是他的直接劳动对象,奥德修斯从而实现了与外在自然的分离。作为统治者的奥德修斯明白,

他远离自然必须以奴役水手们为前提,也就是他要在群体中实现劳动分工,在分工中他成为管理者。其次,奥德修斯主动阉割自我的身体与欲望(内在自然)。奥德修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歌声的诱惑,他命令仆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为了自我保存,他懂得了克制。克制使奥德修斯能获得英雄的头衔,但它以牺牲梦想为代价,这意味着奥德修斯从此将离完整而普遍的幸福快乐越来越远。其实,奥德修斯在内心深处仍渴望海妖的歌声,虽然被绑在桅杆上,但他仍奋力抗争,希冀得到快乐和幸福,但最终他还是不得不臣服于自我保存的理性。在这种臣服中,他将自然的身体与欲望从自身中剷除。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说:“在这里,自我持存与体力分裂开了:奥德修斯体育上的成就,并不关心什么实际的需要,它不过是一种绅士的运动,是镇定自若的主人毕生致力的一种训练。”^{[4]55-56}自然的身体和欲望在自我保存理性前消失殆尽,和身体有关的都成为了禁忌,尤其是爱情和性。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对奥德修斯的分析中意识到,爱情和性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早已作为一种禁忌被传播。爱情与自我保存本质上是对立的,它常常蕴含着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为了接近和亲近另一个人,人总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并从实现自己的角度出发而变得冷漠无情。冷漠是为了获得好感,但同时又远离了好感本身。因此,爱情本身就不存在,或者爱情从自我意识确立起就消失了。相对于奥德修斯,水手们还保持着纯洁的天真,他们或许还并不懂得运用欺骗和狡计来保存自我。那水手们的命运又该如何呢?他们在奥德修斯的安排中,已经被动接受了劳动分工。在分工关系中,水手们的劳动虽然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但他们与自然的交道都是在强制和绝望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他们的生命力量并不能在自然对象中真正对象化,从而也并不能与自然产生真正的沟通对话关系,水手们在被动中也实现了与外在自然的分离。而对于内在自身的身体或欲望,水手们来不及反思,统治者们就已经为其安排好——为了让水手们抵挡住海妖歌声的诱惑,奥德修斯在他们的耳朵里已经塞上了蜡。

奥德修斯们为了自我保存,就必须主动地压抑自己的本能,主动异化,掌握对水手们的绝对控制权;与之相反,水手们则是一种被动的异化状

态。在这个社会分工体系中，无论是奥德修斯还是水手们，最终都成功实现了对内外自然的抵制。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现代启蒙运动就是一场彻底剥离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全面运动。阿多诺说：“奥得修斯式的狡诈实际上就是一种被救赎了的工具精神，他让自己屈服于自然，把自然转换成为自然的东西，并在把自己奉献给自然的过程中出卖了自然。”^{[4]57}随着内外自然的抽离，自我得以确立，但这个自我，是先验的并清洗掉内外自然的自我，从这个意义而言，它实际上就是通过抽象同一性原则对自然进行排斥后的抽象概念符号。

二、重构自然的方法转型：否定辩证法

启蒙理性的同一性原则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内外自然被剥离。在阿多诺的启蒙理性中，自然似乎仅仅就是被同一性所吞噬的存在。为此，哈贝马斯曾批判阿多诺，认为其对自然的理解完全是被同一性所异化的悲观主义路数。哈贝马斯写道：“《启蒙辩证法》中充满了悖论：它为理性的自我批判指明了道路。但同时又怀疑，‘在彻底异化的前提上，我们是否还能把握住真理观念’。”^[8]事实真如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那样吗？其实，阿多诺在《自然历史观念》《启蒙辩证法》及后来的《否定辩证法》等作品中一直暗含了一种思考：自然在同一性的归化收编中是否能走出启蒙理性同一性的魔咒？或说自然如何能被拯救？笔者以为，阿多诺对自然的思考一直离不开否定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实际上，我们只有先了解他的否定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阿多诺视野中的自然。

在阿多诺看来，否定辩证法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对既有理论图式和一般方法的反对。从一开始，阿多诺就是反体系与反逻辑的。“否定辩证法”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否定”，一是“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否定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即否定性，“辩证法”将否定性贯彻到底。“辩证法”本身表明了事物具有矛盾对立面共存的属性，阿多诺认为它应该是真正的否定，而不是肯定穿着否定的外衣。辩证法不是对事物肯定性的客观描述，而是对自身的否定。“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

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的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形式。”^{[5]142}阿多诺的辩证法始终贯彻否定性，遵循一种“崩溃的”逻辑；他的否定辩证法甚至是彻底、绝对的，反对任何肯定元素。他的否定辩证法更多取自于黑格尔的“有规定的否定”，即一种否定主义的态度。黑格尔曾说：“通过把结果如同它在真理中那样把握为特定的否定，借此就直接产生出一种新的形式，而在这一否定中，就造成了那种过渡；通过这种过渡，那贯穿各个形态的完整序列的进程，就自行产生出来了。”^[9]其哲学的灵魂即否定。他认为，事物的发展都有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几个阶段。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否定推动了事物的不断突破和自我实现。阿多诺不满于黑格尔，认为黑格尔的否定最终也走向了精神总体的同一，绝对精神发展到“否定之否定”阶段即是一种肯定，“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种同一性，一种新的幻觉……”^{[5]157}阿多诺以为，由“否定之否定”推论出肯定，只是证明第一次否定并不是很彻底和充分。由此看来，阿多诺是要建立一种绝对的、彻底的否定辩证法。绝对的否定辩证法意味着抵抗与否定是永恒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概念。他声称：“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预先并不采取一种立场。”^{[5]3}如果辩证法是凝固的立场，那么其又回到了肯定性的思路上来。

阿多诺的否定策略实际上是反对事物对立面的最终和解与统一，强调事物内部的永恒冲突与矛盾。在他看来，矛盾是否定辩证法的核心法则：“辩证地演进意味着在矛盾中思维，既支持在事物一度经验到的矛盾，又反对矛盾。现实中的矛盾在于它是一种反对现实的矛盾。”^{[5]142}可以说，辩证法就是“矛盾地思考矛盾”。其否定辩证法就是对历史生存中的深层矛盾的自觉，或者说，否定辩证法的根本任务即研究处于同一事物内部的差异性 or 矛盾性。以往的哲学尽管承认整体是矛盾的，甚至认为宇宙的基础即矛盾，但由于偏爱“同一性”，其使矛盾成为达到“同一性”的工具和手段，阿多诺则认为，矛盾不仅仅是同一性，也聚焦非同一性。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同一性”是统摄外在具体事物的概念，也意味着一种规定

性：“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归在什么之下、例示或表现什么以及本身不是什么。”^{[51]46}但在同一性中，也有被它所不容和压制的一些异己式的存在，阿多诺曾说：“在非同一性的内部有它和它不是的东西的联系，这种东西也就是它的被操纵的、冻结的同一性对它隐瞒的东西。”^{[51]61}对他而言，为同一性所“隐瞒的东西”就是非同一性，非同一性是对同一性的大反动。在某种程度上，否定的辩证法即非同一性的哲学；同一性意味着概念崇拜，反对同一性即反对概念对活生生事物的压制。因此，非同一性首先意味着强化对感性事物的关注，走向事物本身。他说：“非概念性与概念不可分割，它不承认概念的自在的存在，它改变着概念。非概念性的概念不能停留在自身，停留在认识论，认识论迫使哲学去关注事物。”^{[51]34}在阿多诺的否定哲学中，他一直强调客体优先的原则。

既然如此，那么否定辩证法是不是就要走到强调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另一极端呢？或者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不是只关注非同一性而绝对否定同一性呢？很显然，这并不是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应有之义。如果走到个体和特殊的极端，那就意味着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又沦入到前面所提到的统一的形而上学即肯定性路子。他说：“个别的实存者并不和它的总括性的一般实存概念相一致，但它也不是认识徒劳地想消灭的另一种不可解释的‘最终之物’。”^{[51]59}“最终之物”正是他要推翻的同一性，因此，非同一性并不意味着绝对否定同一性。他深刻地意识到，人的思维意味着同一，而思维的产物概念必然也就是同一。他说：“人们可以看透同一性原则，但没有同一性人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规定性都是同一化。”^{[51]46}因此，他要反对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一。他并不反对思维概念中包含的合理的同一性，而是要消解那种专断的同一性逻辑，即粗暴地吞噬感性事物本身的同一性。他以现实生活中的商品交换原则为例来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假如可比较性作为一个尺度范畴而被简单地取消了，那么，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合理性——当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但也是作为一个前提——就会让位于直接占有，让位于暴力。”^{[51]44}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通过等价交换实现了人与人

之间的公正平等性，相对于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的无条件剥夺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阿多诺并非批判商品交换原则的进步性，而是要批判通过商品交换而掩饰的一些不平等的要素，因此，其否定辩证法并不是对同一性的绝对否定。对他而言，在必要的同一性中坚持非同一性，这才是他所期待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具有一种很深刻的辩证关系，非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取消同一性，而是强调与同一性的矛盾共存。他说：“在这种意义上，非同一物就是事物自身的、反对它的同一化物的同一性。”^{[51]59}他强调否定辩证法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是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二者构成矛盾的两极。

在否定辩证法的两极结构中，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具有向对立面转化的潜在趋势和内在的动力，但又不指望它们变成真正的对立面。一个事物是通过对它的否定走向自身的，阿多诺曾说：“‘A’应是它尚未是的东西。”^{[51]47}不是A的东西界定着A的存在，即A是在对自身的否定中建构的。真正认识同类的不是同类，而是非同类，在此，A即是非A。其实，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思想在《启蒙辩证法》中就已孕育萌芽，在该书的附论2中，他花大篇幅分析了何谓快乐。快乐并不意味着幸福与温情，相反，其与残暴交织在一起，人类的爱情尤其如此，男女之间的爱情或性吸引在根源上即为施虐。这一点，他从尼采那里得到了启发，因为尼采把情爱看成刻骨的仇恨。所以，他最后总结说：“无情才是真正的快乐，它表现为秩序的无法调和的矛盾。”^{[4]122}由此看来，否定辩证法思想一直贯穿在阿多诺作品中，其在《否定辩证法》中渐趋成熟并发展为一种正式的理论。按照否定辩证法的逻辑，非同一性是通过同一性来达到的，“矛盾是从同一性方面来看的非同一性”^{[5]3}。非同一性就潜含在同时性的否定中，这正是阿多诺矛盾差异方面的辩证关系。

三、自然的重构与救赎：“自然历史”

阿多诺集中阐释自然这一概念的作品是《自然历史观念》，该文是他在康德学会法兰克福分会上做的一次演讲。该文早于《否定辩证法》发表，全方位展示了他的否定辩证法思想。在否定辩证法的框架体系内，他并未打算追寻一个超越历史

的所谓自然的存在基础，而是努力在自然与历史的矛盾张力关系中重构自然，所以他提出了“自然历史”观念。

在对“自然历史”观念的考察中，阿多诺首先分别分析了“自然”和“历史”两个概念。他将“自然”解释为“从来就存在之物，即背负了人类历史的命定的、先行规定的存在”^{[10]234}。在他看来，自然作为一种“命定的、先行规定的存在”，是在人类介入之前就已存在的存在，它是前文明的象征^{[10]234}。“历史”则指“在传统中建立起来的行为方式，而所谓传统行为方式的首要特征就是新质出现在其中，它不是一个在单纯的同一中、在既成事物的简单再生产中发生的运动，相反，是一个在新事物不断涌现中发生的运动，是一个通过在其中出现的新事物而获得自己真实特征的运动”^{[10]234}。历史展现了时间的延续过程，虽然阿多诺试图界定“自然”与“历史”，但他一再强调，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并不“意味它们有了最终的定义”^{[10]234}。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纯粹静止的“自然”概念，自然作为“先行规定”的存在，同时也背负了“人类历史”，自然与历史相互交错。很显然，为了“辩证地克服自然和历史之间的一般对立”^{[10]233}，阿多诺在谈到自然时，势必就要在历史中谈自然。

阿多诺“自然历史”观念受到了卢卡奇和本雅明“第二自然”概念的启发。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谈到“第二自然”时说：“第二自然并不像第一自然那样是无声的、彰显的和无感知的；它是僵化了的、变得陌生的、不再能唤醒内心活动的感觉综合体；它是腐朽了的内心活动的一个陈尸所……”^[11]在卢卡奇看来，相对于第一自然，第二自然是一个感觉的综合体，包含了人在其中的活动，石化了的历史就是自然。卢卡奇谈论自然时，永远都离不开历史的视角。关于自然问题，本雅明显然要比卢卡奇走得更远。卢卡奇实现了历史事物向自然的还原，本雅明则认为自然是易逝的，并因其时间的维度包含着历史的要素，而且，历史的要素无论在何时显现，它都要反过来指向在它之中消逝了的自然要素。在卢卡奇和本雅明这里，“第二自然”并非浪漫主义所主张的纯然、未受人类干扰的世界，而与人、历史密切勾连。正是吸收了卢卡奇和本雅明的理论营养，

阿多诺立足于现实与当下，试图实现自然与历史的融合与交汇。他指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分界一旦确立，就只能通过反思来模糊它而不是抹掉它。……必须要靠思维把整个自然（及其对等物）视作历史，亦即把整个历史视作自然。”^[12]他甚至认为，将具体历史还原为自然，这是历史哲学本体论最基本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历史，它们是一体之两面，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总是处于张力关系中。其实，马克思在思考自然问题时，也是把其放在与历史的关系中来展开的。施密特曾评价说：“马克思的自然观念与其他各种自然观念的区别，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历史的特征。”^[13]就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阿多诺自认为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和更为彻底。马克思承认自然与历史的纠缠交织，但马克思在自然与历史的抗争中坚信绝对纯粹自然终将会复活。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与浪漫主义者在终点上并无二致，他们都期待一个纯粹而未被人所干扰的世界。阿多诺并不期望自然在与历史的抗争中最终以压倒性的胜利者姿态出现，他只是强调了二者的对抗和矛盾。自然既是原始的晦暗状态，也是一种历史事件；自然既是转瞬即逝的存在，又是时间历史的产物；它既表现为偶然性和非同一性的逻辑，也不可避免地会烙上同一性的标签。自然具有自身的“自然维度”——原始天然的状态，也具有历史性的维度——同一性的外观。自然与历史并非二元对立的两极，也不存在谁占上风的问题，二者相互交织，呈现为一种张力关系。

对抗和矛盾其实隐含着一种二者相互否定的关系，即历史对自然的否定和自然对历史的否定。由此，自然就是在历史的否定中实现自我。与之相应，认识自然不是正向地追问自然最为本体的基础，而是反向地在历史中寻找。在否定的辩证结构中，历史对自然的否定不是离自然越来越远，而是在历史否定的最深处越靠近那个神秘的更遥远的自然。阿多诺说：“如果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被严肃地提出来的，如果历史性存在在其最具有历史规定性之外，也就是最具有历史性之处做到了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自然存在，或者，如果在自然看似最深入地固执于己的地方做到了把自然理解为一种历史性存在，那么，它就给解决

问题提供了机会。”^{[10]239}也就是说,正是在这种相互最为深刻的否定中,自然与历史的分裂问题反而被解决了,也更好地实现了自身。由此可见,他对自然的否定并不仅仅是对现实同一性的悲观呈现,而是在历史的呈现中主动建构自然并主动寻找拯救自然的策略。阿多诺并非悲观主义者,其在否定批判中寄予了希望。

对自我否定得越深刻,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否定救赎的思路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随处可见。在《启蒙辩证法》附论1的结尾部分,阿多诺讨论了荷马在描述惩罚等残害之举的态度倾向。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儿子讲述了他如何残酷惩罚那些堕落成妓女而没有信仰的女人,荷马对女人被处以绞刑的全过程进行了极为冷静克制的描述。荷马的描述看起来有些冷漠无情,但阿多诺却以为,荷马的冷漠无情是一种“欺骗”。欺骗是用虚假的言行来掩盖事实的真相,实际上,荷马“通过把描述切成各个碎片,荷马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牺牲者,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妇女在同死亡进行的短暂斗争中所经历的无法言说的永恒苦难”^{[4]80}。痛苦和苦难打破了快乐对权力的蒙蔽,敞开了被摧残的真实感受。体验痛苦的个体不再寄希望于乌托邦,而是深深体悟到错误的社会和被损害的生活不应如此。在他这里,“痛苦成了真理的本质”^{[4]127},希望正是在对痛苦和苦难的反思中萌芽。阿多诺说:“荷马通过返回到各种曾经的事件,面对史前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相互纠缠的局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慰藉。因此,史诗首先是一部小说,渐渐才会让渡成为童话。”^{[4]80}童话成为希望的隐喻,源于史诗的让渡。毁灭最惨烈之处恰恰是光明的诞生之所,这正是阿多诺从否定辩证法中生发出的救赎思路。在其否定辩证法的构想中,启蒙的权力性统治在早期的孕育中实际上已生发出了它的对立面——反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本身也包含了颠覆权力的元素。

因此,阿多诺所理解的自然就不是哈贝马斯所批判的完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的表达,其在自我的深刻否定中本身内含了一种拯救。他写道:“启蒙绝不是启蒙,在其异化形式中,自然得到了清楚的呈现。精神作为与自身分裂的自然,在其自我认识中,就像在史前时期一样,自然呼唤着自我,

但是不再直接用它的全能之名,把自己唤作曼纳,而只是把自己叫做一种闭目塞听、残缺不全的存在。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没有这种征服,精神就不会存在,一旦精神承认是统治并隐退于自然,那么,它就会放弃这种能使其成为自然的奴仆的统治观念。”^{[4]37}对启蒙和自然的拯救并不是追寻一个既定的自然概念,而是要在“自我认识”中呼唤自然。“自我认识”就是要正视、揭示和反思在自然与历史的张力关系中自然如何被历史所征服、掠夺和统治。如前所述,阿多诺通过奥德修斯返乡的故事来说明了人的精神如何从自然中区别出来并成为独立的存在。奥德修斯得以存在的手段就是狡计。其面对强大的外在自然,表现出对自然的畏惧和模仿,甚至将自己献祭出去。这一系列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出于对自然的无私敬畏,而是通过向自然的模仿甚至献祭最终达到对自然的出卖目的并实现自我的祈求。阿多诺认为,我们要对“绝对自我”及其历史进行批判和反思。在这种批判与反思中,自然再也不是“绝对自我”意图和伤害的对象,反而有了自身的目的。更进一步,历史与自然的关系再也不是单向的主体对对象的控制,而是双向的交往,并最终实现了一种和解。他在《自然与历史观念》一文中写道:“最后,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神话的决定性主题即和解主题,亦为貌似所独有……我指的是和解的要素,它就在世界最虚幻之处显现出来的地方:在世界同时被所有‘意义’最紧密包围的地方,和解的希望被最完美地给予了。”^{[10]246}在这里,“意义”即脱离个别特殊的同一性,也就是历史,在历史展现最充分的地方呈现了最遥远的那个自然——即古代最原初的历史之物。自然在对“绝对自我”的反思与批判中被唤醒了。在历史与自然的和解之处,也即同一性中显现出非同一性,那正是自然美之所在。

阿多诺通过绝对永恒的对抗和否定试图打破自然与历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尝试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是一切本体论哲学和体系哲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哪怕海德格尔的新本体论在探讨二者的弥合时也留有遗憾。在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透视下,自然不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其与历史交叉互动,处于不断的生

长生成中。阿多诺对自然的理解，完全超越了近代以来的机械自然观——即把自然理解为静止的外在对象的集合，其更接近古希腊和现代的有机自然观。正因为如此，他在美学中才能给自然美留有一席之地。不过，在否定辩证法的理论框架内，其自然的实现只能通过作为对立面的历史来间接实现，因而，自然异化为历史，并不直接表现为自身。从这个角度而言，自然在阿多诺那里只剩下观念的气息，而与现实的自然毫无关联。正如戴维·罗伯特在《光晕以及自然的生态美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自然在阿多诺那里作为真理模式，其结果即为“自然被升华到消失，只留下了光晕，即其精神的本质，如同柴郡猫那神秘的微笑”^[14]。另外，在阿多诺那里，对自然的“回忆”所依赖的方法论基础也有一定悖论性。否定辩证法极力主张消解同一性和肯定性因素，抵制形而上学的“和解”，但在自然与历史的张力中，阿多诺却将真正自然的显现寄托于与历史的和解之处，因此，他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其正如沃林所批判的那样，“阿多诺的思想——尽管以否定辩证法的概念相标榜——仍徘徊在传统形而上学真理理论的视野之内……这种缅怀考虑到了模仿和和谐范畴在他的思想中的独特地位——与外在世界的某种友善的非对象化联系的重要性。和谐表现了对于某种超越于主体和客体之上的未来状态的明确希望”^{[21][27]}。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激烈而尖锐，但最终又走向一种中和与平衡。由此可见，真正的辩证法也许并不是如阿多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绝对的否定，其在否定中也有肯定与建构。

参考文献：

- [1] 阿多诺. 美学理论 [M]. 王柯平,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130.
- [2] 沃林. 文化批评的观念: 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M]. 张国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3]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3.
- [4]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5] 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 [M]. 张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6] 莫小红. 肯定式超越与否定式批判: 尼采、阿多诺艺术救赎观之比较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3): 124.
- [7] HORKHEIMER M, ADORNO T W.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23.
- [8]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66.
- [9] 黑格尔. 逻辑学: 上卷 [M]. 杨一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99.
- [10] 阿多诺. 自然历史观念 [M]// 张一兵.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2辑. 张亮,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 [11] 卢卡奇. 小说理论: 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 [M]. 燕宏远, 李怀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57.
- [12] ADORNO T W. Negative Dialectics [M]. New York: Continuum, 1973: 359.
- [13] A·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M]. 欧力同, 吴仲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2.
- [14] 郭军, 曹雷雨. 论瓦尔特·本雅: 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159.

责任编辑: 黄声波